



一个平民的政治主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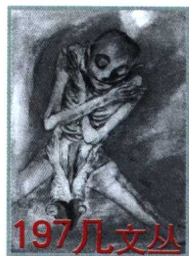
程亚文 著

人类及其文化的存在
在想像之境
浮现出它的
价值与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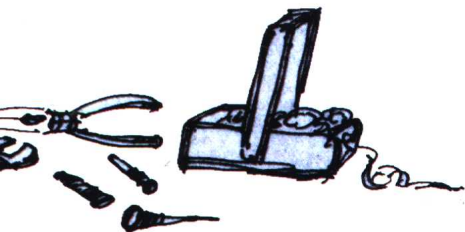


一个平民的政治主张

程亚文 著



海南出版社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平民的政治主张 / 程业文 著

—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2.5

ISBN 7-5443-0387-X

I. 一... II. 程... III. ①论文—政治—研究—文集

IV.D6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第 063611 号

一个平民的政治主张

作 者: 程业文

责任编辑: 黄明雨

封面设计: 第三工作室

版式设计: 孙志敏

责任校对: 汤万星

责任印制: 李 兵

印刷装订: 北京宏伟印刷厂

读者服务: 杨秀美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编: 570216

电话: 0898-66812776

E-mail: hnbook@263.net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出版日期: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75

字数: 220 千字

印数: 5000 册

书号: ISBN 7-5443-0387-X/F·45

定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违者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装订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更换

邮寄地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杨秀美女士 收 / 邮编: 570216

序 在情感和理性之间

房 宁

摆在我面前这份书稿的作者程亚文先生，今年刚满 30 岁。而立之年已将文稿结集出版是件了不起的事情，说明了作者的天分和勤奋。当然，在天分和勤奋之外，应当说，作者也有几分幸运，就是俗话说说的“赶上了好时候”。

程亚文出生于 1972 年。1972 年在中国现当代史上可是个重要的年份。此前一年的秋天，一度风光无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林副统帅”仓皇出逃，折戟沉沙。林彪集团的覆亡在逻辑上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而转年的早春，美国总统尼克松戏剧性穿越他们所谓的“铁幕”，来访中国。当尼克松来到中南海拜访毛泽东的时候，也正是“冷战”在历史的逻辑上结束的那一刻。如果需要确定一个年份来标志当代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史的某一阶段的话，1972 年是当之无愧的。程先生正好出生在这一年。

1972 年以后的历史，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都不陌生。但我想对这段历史最具有认知能力的，也许并不是曾经被深深搅入其中的老年人，甚至也不是我这般有一些经历的中年人，而很可能是伴随这个年代成长的年轻人，特别是像程亚文这样的有着敏锐的感觉和思考能力并具备表达能力的人物。因为，这 30 年正是他们长大成人的 30 年，生活为他们的人生涂上了底色，而他们用青年人所特有的单纯感受着这个年代，在他们那里便会少有扭曲与成

见。这也是我饶有兴味地阅读这部书稿的原因之一。

如果要从程亚文的书中理出此一代人思想成长的线索，这也许就是从衍生别人的情感到进行自己的理性的思考。

本书的作者上小学时候，正是改革开放启始的年代。作者的启蒙教育与被当今中国的那些文化名人、精神导师倡导的现代化的新启蒙正好同步。这两个“启蒙”自然是有所融汇。文集集中的第四辑“情感的维度”中如实地记录了作者在这种经历中获得的感觉。

与稚童的朝气和天真绝对不同的是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绝大部分时间里弥散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那种低调、压抑和沮丧的气氛。痛苦的回忆、控诉、反思，是“文革”结束后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主要话题。当下的学术泰斗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当数这种代际告知学的扛鼎之作。老一代的苦心当然不会白费，他们的情感传递给了下一代人，程亚文曾在《春天、资本主义及其他——〈牛棚杂忆〉读后》一文忠实记录了他的感觉，他动情地写道：“我相信，只要是认真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感受到心灵上的震撼。对于没有经历过‘文革’、年轻如我辈来说，书中类于天方夜谭的故事会使我们情不自禁产生疑问和困惑：就在我们这个号称‘礼仪之邦’、崇尚‘仁义礼智信’的国度，就在不久之前，真的会有这样残酷的故事发生，真有一大群一大群的人曾经遭遇过那般的离奇与惨痛？！”

人的心理发育常有个从情感到理性的过程。在社会政治文化的层面上，情感是初级的，理性是高级的，但理性往往要经过情感。对于理性认识而言，感性认识往往是不可超越的。认识的真实常常是从感性到理性。如果说程亚文在“蒙学”阶段的文字更多是真诚地记载了他的情感，那么，在经历了自己的生活以及思考后的文字，则更多体现了一种真实的理性。

我自己认为，与在“文革”中碰得头破血流的老一辈相比，

像程亚文这样的年轻人其实并不轻松。我这里说的年轻人当然是就大多数而言，而非搭上了国际资本快车的新潮一族。在城市里的30岁的人中不少已是“独生子女”，他们曾被误称为“小太阳”，寓意倍受呵护、优裕幸福。而实际情况，特别是他们的感受并非如此。他们从记事起就进入严酷的竞争状态。他们没有童年，他们的确没有被人在半夜抓走，但他们都被“从娃娃抓起”，被超前进行着种种的强化和灌输。经过最严酷的竞争，他们中少数幸运儿进入了大学。大学过去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地位、职业的“保险箱”。但如今大学早已不是什么“保险箱”了，如果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其实上大学的机会成本是更高了，风险更大了。对于绝大多数平民子弟而言，生活的可不是玫瑰色的，幸运之门似乎越来越窄了。

这仅仅还是在谈论当下青年的个人命运和际遇。如果从更宽广的国家、民族的经历看青年一代的成长，他们的阅历与体验就更是波澜起伏了。由于所从事的专业的缘故，多年来我一直关注着中国青年一代的政治社会化方面的问题，注意研究青年一代社会意识、政治意识的形成和发展问题。从对青少年的直接接触和了解，到研究的众多材料看，这一代青年中的许多人曾经历过一次相当深刻的思想意识上的幻灭与蜕变。

当我这般年纪的人在进入青年时代的当口曾经也遭遇过一次痛苦的幻灭。我们小的时候在稚嫩的心灵里共产主义是一条洒满阳光和鲜花的坦途，然而，当“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我们又突然被告知其实一切都不是那么回事，于是我们的经历了一次精神的幻灭。在我们那一代编织的玫瑰色理想破灭后，并不意味着社会不再需要理想。就在70年代以后，一个金色的理想填补了思想的真空，那就是西方的黄金梦。富裕之邦必是真理之地，我们之所以落后，之所以苦难，就是拒绝了来自西方的福音。于是，问题又变得简单了起来，我们需要告别过去，需要启蒙。我

们也确实认认真真地进行了启蒙，在程亚文的文集中启蒙的印记俯拾即是。但是，今天的程亚文们毕竟从蒙学中毕业了。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 93 年中国申办奥运会失败时大学生们失望的眼神，99 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时大学生们被激怒的眼神，20 多年来中国在一步步地发展，走向强大，但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却日益逼仄，利益冲突的现实替代了情绪上的向往，对西方理想化的信念发生动摇，直至破灭。

这些个人与历史的际遇，使程亚文这代人很快转入一种理性的思考之中。从 1999 年后作者写作的文字，仅看看那一串串惹人眼目的题目——《中国近现代以来战略思维的演变》、《东亚：待想像的共同体》、《面向世界，还是立足东方》、《须从战略思维上审视布什对华政策》、《从马汉到亨廷顿》、《全球化与弱势者的选择》，读者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作者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以及作者宽广的视野与深沉的思绪。震惊世界的 9·11 事件后，作者写了多篇文章，更集中反映了作者观察与认识当今世界的视角的转换。

如果说，情绪是代际渲染和传递的结果，而理性的思考则面对现实后的自主选择。在情感与理性之间的记述也恰恰体现了作者情感与思想上的真诚。这本书具有思想史素材方面的价值。很值得一读。

2002 年 2 月

我们的青春和学术的意义

——“197 几”文丛总序

余世存

一批新学人的文丛，在热心的朋友们的参与下，即将问世。在筹办的过程中，我听到了不少的故事，首先，这些新人们，都是 70 年代出生的，他们跟正当红的美女作家们同龄。找寻这些如今以新人类活跃在社会上的一代人的思想者，可不如寻找美女作家那样容易。听说，吴冠军先生是 1976 年出生的，我知道的林国荣先生更是 1978 年出生的。他们的知识功底自不待说，而且他们也自觉地思考生命和社会之重。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实，我因此愿意接受卢周来先生和出版社的邀请，读其样稿，并为之说几句话。

说到对新学人的期待或关注，我大概不算太晚。1996 年前后，经朋友提醒，我开始注意到 90 年代高校学生的情况。我自己是 60 年代出生，80 年代在高校受教育的这一代人。我们闷头闷脑地被赶到社会上后，无论是知识准备还是心理准备相当不够。我仅仅知道我们对艺术、真理、知识等等曾登堂窥奥，我们见识过某种新异的人生境界，我们的使命乃是让我们的同胞了解并拥有生的灿烂。至于才学识等等倒在其次，反正那时的我心里特别地虚，在大学入宝山空归的感觉庶几类似，当然到现在也仍觉得自己无特异，无大能。我们空有理想、青春、热血，缺乏足够的学识和经验，这种理想情操使我们对人生有自己的标准，不仅知

道同龄人的背叛，也明了他人的距离。例如对上一代人，四五一代，上山下乡的一代，我们是悲悯的，觉得他们的青春虚掷得可以；而对后生小子大抵是轻视的，觉得他们接近物欲，他们大部分都俗得可以。因此，尽管我们知道自己的悲剧，我们仍觉得自己足够坚实足够自豪，我在《哀朱海军》一文里，就这么说过，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凉心眼要么看兄长一代们帮忙帮闲，要么看新人类们莺莺燕燕。

为什么要用“代”来立论？因为代际存在是我们社会的主导形式。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在大学里明明都学会了现代社会那种科学的分析说明，届，级，等等。我们在届级一类的划分里相辅相成，共生共荣。但为什么到了社会上（自然也包括大学体制）却摇身变成了代的存在。代际的更替总是以革命性否定性为本质来完成的。假如我们想到第三代第四代一类的字眼，想到新生代，新人类，新新人类一类的字眼，上一代人必须退出历史舞台，才有后代人的活动空间；新人们必须用各种方法例如身体写作一类，才有可能颠覆上一代人的活动方式，……我们也许能承认我们社会这种最为实在现象的悲剧或滑稽性质。

这是我们社会的特性之一。那就是，直到今天，我们的知识流布极为艰难、狭窄。同样的知识内容很难均匀地分布到知识人那里，更难指望下一代人有同样的接受和运用效果。而知识之外的际遇，参与了知识人的身份构成。因此，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几乎没有什么积累或连续性，其抱残守缺为人诟病又无可奈何。每一代人都参与了革命性的破坏，文化大革命不过是极端表面的形式。如果说传统中国的知识至多是跟着王朝解体而出现革命的现象，（因为道统的延续，其革命多表现为道统内部的学派创新），那么，近来以来的中国知识则在代与代之间发生了造反式革命。即以上个世纪为例，30年代北平的沙龙如何看得上五四的激昂，40年代救亡的声音又如何容得下知识演进的从容，50年代

则更要在一穷二白上描画蓝图，60年代要彻底否定以前，70年代自以为拨乱反正，80年代引进西方知识以进行思想启蒙，90年代以学术热轻嘲启蒙的空疏。假如我们诚实地理解这些现象，我们得承认这种革命现象，不是知识本身生发的革命，而是每一代人借助于知识之外的力量，进行造反，进行代际的疏离和相互敌视；不是知识的延续更新，而是知识霸权的更替，言必称希腊者，言必称马列者，言必称传统者，言必称后现代者，言必称全球化者。合法性正当性被抛离一边，共和共生的多样丰富被弃置，当一代知识人的主流地位或体制权威确立后，就只剩下对其他人的敌视封锁屏蔽，剩下命令利用粗暴教训，剩下体制权力带来的腐败僵化保守。而知识的传承更新竟需要一代人的退场才有可能，一代人如果不是因为自然原因（高龄、死亡），就不会出现新一代知识人的机会和得意。而我们看到，除旧布新，用时髦的话说，不过是双方或各方争夺知识的霸权，是争夺权力的位置。

这恰恰说明，我们近代以来的知识体制里的身份职位都是缺乏现代性说明的伪身份职位，我们的知识霸权是缺乏文明道统支撑的伪权力。我们的知识在世界知识和现代理性的参照下，尚未能完成传统知识结构向现代知识体制的更新，如前说，知识体制必须容纳各方的知识创造，自由独立是其标准也是目的。但是，事实上，我们的知识体制仍需要其所归属的知识人来说明，从而，这个我曾称为前现代社会的伪身份伪权力大大诱惑了知识人，以为自己一旦占据体制的身份就能攻破体制的堡垒，就能发布深刻伟大的学术思想；新一代知识人要想占据体制就得推翻和革命掉旧的知识人。貌似维新，却在所谓“学术思想”的名义下迫害限制了其他人的学术思想，客观上不过是占据了体制的好位置，并不能使体制革新。这种悖论使我们的知识界充满了代与代之间的革命，维新进步一说无从谈起。四五一代人在90年代最具

有创造性表演的时间就面临着这种紧张难堪，他们以为体制内的位置和知识里的创造是可以兼得的，尽管有人质疑过他们是否是独立的知识分子，但他们仍以为能够代言知识、良知和正义。就这样，这个知识的体制是需要改造甚至废掉的，可是我们缺少另外的身份感来抗击它（民间办学和民间学人还未能形成自己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知识界没有自觉合力对抗这一伪身份体制的诱惑，没有权力自觉及正当实践，从而有效地消解知识体制的僵化腐败，使我们的知识体制有着开放的自由、机会活力和权威尊严。

这种体制如何改造或废掉？我不知道确切的答案。我和一些朋友划分过百年来几代中国学人，与其说我强调的是革命，不如说我呼吁的是和解。我想说的是，所有那些自以为空前绝后具有超越特性的知识人，都将归队于他所属的一代人的精神使命。四五一代人，我这一代人，等等，也许历史在悲喜剧里赋予了他们不同的精神要素，但这些历史精神本身是并行而不相害的。假如一代人逆所谓天命或历史潮流，以知识、真理或良知正义一类的名义行事，命运会安排另一代人来为他们送行。那里同样有知识，有真理，有良知正义，更有青春。

如今，7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上场了，尽管知识之外还缺乏大的历史事件使他们现身，或者，他们将永远消失在所谓的市场社会里，消失在世俗的微小叙事里。那是否是我们社会的幸事？是否意味着我们的知识体制，我们知识的传承、荣耀和权利分配等问题永远锁定了。但是，就连知识体制外，大量流亡江湖的我这一代、四五一代都在以各种方式消解嘲弄着体制的岸然道貌，而且，据我所知，北京的一些年轻朋友也在近两年对知识体制进行了有力的抗争。这说明，知识体制的存废是我们当下最重要的命题之一。年轻的朋友们从对西方经典的解读入手，一步步抵达知识、生活的真理殿堂。正是有西方经典等世界知识作为理由，他

们对当代汉语知识的简陋了然于心（是否也对现行中国知识体制的局限或专横了然于心？）。我那时关注他们，听说他们将要有所贡献于学术，坐冷板凳，自觉与浮躁的现实社会保持距离，为此不惜对现实保持沉默以与现实体制绝决。我的敬重之心难以言表。悲剧性的在于，他们的知识活动，他们超越于“城邦”现实之上的哲学家般的生活，也不会是一块净土，他们仍得立足于他们与之保持距离的城邦现实本身。这种现实体制限制了他们的革命性本质。他们也将走一代代人的老路，理想颓唐，沮丧无力，人生造化，原来如此。

是的，即使与他们的大学青春期比，时代也发生了质的变化。90年代初“淘金”的希望何止于纯粹经济领域，不仅项飏先生有那样好的际遇和勇气；而且，民办学校也风起云涌，小学中学大学，知识的传承对官学的惟一性和绝对性构成了竞争；大量的青年学人流入社会，他们自有与体制距离的眼光和创造抱负。……但是，今天，所有这些良性的因素已经消失，浙江村在市民的眼里消失，民众对生活不再充满暴富的希望，只有苟活的不安恐惧和仇恨；民办学校是官学的复制物，工具性更为明显，他们无力也无意识创建自己的学术机制；而青年学人们也只有跻身于学院科研院所才有出头的可能；四五一代人的知识关怀日益减弱，尽管新左或自由主义的思路言路使知识界一度显出分裂之势，但他们人生中年虚无的心态已在体制里都乐得颐养天年；我这一代人也适应并消失在中国社会体制里，知识共同体的重建失去了力量。学术腐败因此能在越来越封闭和支离破碎的学术界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少数流落民间的独立或自由撰稿人要么孤军奋战，要么寄身于戏子娱乐的行业。我们的时代充满了热闹，但我们的希望落空，我们收获的是跳蚤，当初种下的可都是龙种。

幸又不幸的是，青春仍在，青春也是自足的。当现实社会无任何声援、呼应时，革命会与青春同行。随着社会的发展，“城

邦”的新生活新经济新文化等等的出现，当代汉语思想界呈现疲乏之相，无力参与影响中国人的社会公共生活时，在四五一代和我这一代渐渐消歇之时，终有一些朋友打破沉默，面向社会发言，这既是青春的内在要求，也是革命的逻辑要求。这些年轻的朋友们，余杰、安替、吴冠军、卢周来、程亚文、谢有顺、黄钟、李猛、高超群、张健、于杰，等等正成为我们这个众声喧哗时代的语言之声，而年轻得让人生顾惜之心的林国荣、王怡们，正以知识思想的坚硬质地应对着我们社会的荒唐闹剧。这些并不全然能与读者见面的文字终于以文丛（虽然初步只有几位作者）的形式出版，或者能给有心人不小的启示。

我之看重这些文字，是因为这些文字多来自不曾受体制污染的目光，黄钟先生的文字真正属于“抽屉文字”，他的言路因诉诸常识的思路而为纸质媒体拒绝；谢有顺先生的文字有着域外的批评分析气质，他直面现象同情而有耐心；程亚文先生则在思想一个民族如何自处并与其他民族国家共处时有着难得的自由独立的心态；至于卢周来先生，其对社会公正的担当近年来已成为知识界重要的话题之一。我相信70年代学人对中国社会的介入有助于汉语知识为中国人早日寻找到那个“说法儿”。中国人生多罪与苦，中国人的精神需要安慰用嗷嗷待哺一说绝非虚词。有那么多江湖庸医大行其道，有那么多所谓繁荣的思想随笔的出现，我想，关于我们时代社会的真知灼见的必要性几乎是不言而喻的。想想看，我们在知识里活得像模像样，那么，年轻的朋友是如何看待我们的，又是如何看待我们的社会的？我们的社会接近了人的常识吗，我们的外交哲学平易健康吗，我们的经济生活公正吗，我们的文艺创作提升过我们的生活吗，这些大而具体的问题也是新人类们，本文丛的几位作者黄钟、程亚文、卢周来等先生思考的问题。

既然人生多苦罪，那么，庸医或各类中华将开太平的功法所

提供的，不过是“伪善”“傻美”（毛喻原先生语，他是四五一代人）一类的“软乎乎的幸福主义”（林国荣先生语，他是70年代生人），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批判精神的在场。所谓批判精神的在场，一定是体制内的权力自觉和权力实践。体制外，不过是历史或自然的辩证法则，即青春、思想的存在本身的要求。既然我们的知识体制已经失去合法性，已经弃置正当性，那么，批判精神只能由青春、思想来继承。知识体制或知识共同体，和中国“说法儿”，这双重的任务落到新一代学人身上，正说明我们民族的某种悲剧，即不仅我们知识体制内缺乏自我更新的机能，而且民族成员的各阶层、集团缺乏权力自觉和权力实践，社会的批判精神就仍只能落实到青春血肉之躯那里，落实到对知识还新鲜、自觉、尊重的知识人那里，落实到笃信知识乃是祛除人生苦难的思想写作者那里。



程亚文 1972年生，安徽桐城人，国际政治学者。学术兴趣主要在于历史、文化研究和国际政治领域。近年来，先后在《欧洲》、《开放时代》、《天涯》、《二十一世纪》、《书屋》《世纪中国》等媒体发表学术性文字若干。其中，关于民族主义以及关于“9·11”事件的系列述评性文字与读书随笔获得知识界人士普遍关注。

……在情感与理性之间的记述也恰恰体现了作者情感与思想上的真诚。这本书具有思想史素材方面的价值。很值得一读。

——房 宁



话语的德性

谢有顺 著

批评是一种能“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的写作

游手好闲地思想

黄 铨 著

我们每个人既是宽容的对象，也是宽容者

一个平民的政治主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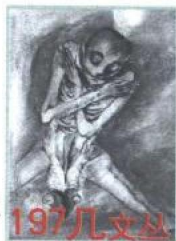
程亚文 著

人类及其文化的存在，在想像之境，浮现出它的价值与意义

穷人与富人的经济学

卢周来 著

任何形式的歧视都是恶，任何与之背道而驰的努力都是善



197 几文丛
海南出版社

目 录

第一辑

中国与世界：在旧思维与新眼光之间

东亚：待想像的共同体	(3)
东亚叙述与当代中国国家安全	(18)
面向世界，还是立足东方	(24)
从“日本威胁论”到“中国威胁论”	(28)
对东南亚发展的另一种观察	(35)
中国近现代以来战略思维的演变	(39)
探寻大国外交的连续性	(51)
战略的文化地图	(59)
国际政治的经济视角	(66)
文化宽容：在道德考量之外	(72)
人道的歧途	(88)
国是乱弹	(100)

第二辑

民族主义：误会与别解

民族主义的历史发展	(121)
一个民族的诞生	(128)
“龙王庙”中的误会	(144)
黄祸论：一段历史，一种言说	(157)
民族主义话语的悖论	(171)